

刺激消费财政政策如何精准发力

发钱还是发券？每轮促消费刺激政策一出，类似的讨论便很容易卷土重来。近日，包括长春、青岛等地在内的全国多地启动新一轮消费券发放活动，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疫情形势的反弹，即便是业内，“直接发钱”的声音也屡有传来。归根结底，两种方式的殊途同归，差别在于谁更适应我国当前国情。但不论发券还是发钱，有一点可以明确，短期刺激不是长久之策，根本还在于常态化疫情防控与生产生活的有效平衡。

发钱或者发券，其最终的目的无外乎是“以小见大”撬动消费。以2020年6月6日启动的北京消费券为例，最终累计发放餐饮购物消费券、智能产品消费券和餐饮外卖消费券共3900万张，实现销售额135.2亿元，拉动杠杆为14.8倍。

60亿部手机将被闲置 每吨能提炼价值5万金属

行业数据测算，2021年我国手机社会保有量已达18.56亿部。随着废旧手机的产生量和闲置量逐年增长，预计“十四五”期间闲置总量累计将达到60亿部。

据业内人士表示，手机拆解物基本上可以百分之百被利用，专业企业能从一吨废旧手机中至少提炼出总价值约5万元的铜、锡、银、黄金等金属。但因用户考虑到隐私等问题，目前我国废旧手机资源回收利用率仅约4%左右。每年新增闲置的手机进入到正规回收领域的还不到30%，有超过70%的手机闲置在用户家里或进行了不环保、非合规的处置，流向无从监测，造成资源浪费，暗藏风险。

(据央视财经)

抖音(2022年反诈报告): 受骗男性是女性近两倍

近日，抖音发布《2022年抖音反诈报告》指出，通过不断打击与治理，尽管平台接到的诈骗举报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随着诈骗行为日趋“多元化”，不法分子主要通过刷单、理财、仿冒、购物、招工、情感等形式实施诈骗，反诈工作仍然艰巨。

与一般女性更容易受骗的刻板印象相比，《报告》显示，受骗者中，男女占比分别为61.62%和38.38%；年龄则是“24至30岁”与“31至40岁”两个阶段最为集中，占比31%和36%。在职业上，“学生”与“待业人士”最易受骗，占比11.45%与4.16%。“快递员”与“医护人员”最为警觉，仅占1%和0.76%。《报告》表示，从已破获案件分析，至少90%抖音受骗用户是被引流至第三方社交平台后遭遇诈骗。因此，识别别、多联动，切断不法分子的流量获取与收益，是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反诈最核心且有效的手段。

摘自《法治周末》

数字人民币试点再扩围

近日，人民银行召开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要求，要有序扩大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在现有试点地区基础上增加天津市、重庆市、广东省广州市、福建省福州市和厦门市、浙江省承办亚运会的6个城市作为试点地区，北京市和河北省张家口市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场景试点结束后转为试点地区。

对此，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更多地区加入试点，有助于对数字人民币进行更大规模的测试应用，进一步完善数字人民币生态，更深度地检验数字人民币系统性能，也有助于更多用户提前体验数字人民币的魅力。今年杭州亚运会将召开，将亚运会场景纳入试点范围，在冬奥会之后再次面向境外人士应用数字人民币，为参加亚运会的相关人士提供更多的支付选择，有助于树立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摘自《证券导报》

但发钱还是发券的分歧，也在不少人认为发券过于鸡肋。此前就有网友吐槽，缺的不是几十的消费券，而是几百几千的本金。

消费券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回答发钱还是发券这一问题之前要明确的重点内容之一。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表示，地方政府层面发放的消费券，其实可以看作是政府主导下的一种促销。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表述为政府拿出一定的补贴，通过商家的促销，既使企业能够运营，又使百姓的支付能力能够体现，从而促进经济景气的循环，进而带动就业，进一步维系企业的生产运营。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得以有效运转，政府就能从中取得必要的流转税，这样的良性循环不仅能够维持就业和基本民生，又能将其

百亿母基金“遍地开花” 中国城市正在“投行化”

近日，一则湖北省整合设立500亿元母基金的消息引发关注。这只母基金将有望引导放大设立5000亿元各类基金，重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现代化工、生态环保、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产业开展投资，助力湖北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成立母基金，出手动辄百亿，湖北已非个例。从泉州交通发展产业母基金、上海百亿引导基金，到西安创新投资基金、成渝双城基金正式运营，再到福建

省海洋经济产业投资基金……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已有京津冀、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江苏、福建、广东、浙江等多地的百亿母基金相继诞生；今年以来，全国又至少有15家百亿母基金设立。

各地为何争相做起了“投行”生意？

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例子之一，就是安徽合肥联手战略投资者引入蔚来汽车。

2020年4月，合肥建投联手三级国资平台70亿元“接盘”亏损112亿元、资金链几近断裂的蔚

来，这让合肥获得了蔚来汽车中国总部的落户。蔚来美股股价随后也从1.19美元飙至66.99美元，市值几度超过奔驰、宝马等传统汽车巨头。

而合肥政府出巨资建立基金平台，先后投资京东方，押注半导体，接盘科大讯飞，引入蔚来、大众，投资维信诺……在投资界，这种以政府基金为主导、以产业招商为先导的新投资方式，甚至直接被称为“合肥模式”。

城市“风投”话题之下，更多地方愈发注意到政府投资的重要意

义。用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布局新兴产业集群，下好一盘漂亮的“先手棋”。

但另一方面，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各级政府引导基金都把引导目标锁定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各地发展目标出现“千城一面”的景象，“政府引导基金发展趋于饱和、投资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原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此前也强调，“政府引导基金要牢记使命，不忘初衷，任务是引导市场，而不干预市场，要雪中送炭。”

摘自《每日经济新闻》

坚决治理“山寨证书” 避免“李逵退出、李鬼横行”

人社部《关于开展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印发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受到各界普遍欢迎。

2013年以来，国务院分7批取消了超过70%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2017年，人社部公布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明确对职业资格实行目录清单式管理，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但在实践中发现，有些机构和单位在利益驱使下，处心积虑钻法律、政策和改

革的空子，打着新职业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等名义，发放各类五花八门的“山寨证书”牟利，严重扰乱了技术技能人才评价秩序，破坏了国家职业资格制度改革来之不易的成果。更有甚者，有机构在未经行业主管部门备案的情况下，喊着“人社部证书退出，哪家证书来接盘”的荒唐口号，公然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之外“另搞一套”，堂而皇之地编造出上千种所谓“注册职业资格证书”，甚至编造出所谓“导弹维修工程师”“装甲车辆工程

师”“武装工程师”“部队政治工作师”“警察管理师”“禁毒师”“刑侦侦查师”“边防指挥师”“司法鉴定工程师”这些涉军涉警涉法的“注册职业资格证书”，令人瞠目结舌。只有坚决治理“山寨证书”，规范技术技能人才评价行为，才能避免“李逵退出、李鬼横行”，有效巩固“放管服”改革成果。

这些上不得台面、经不起检验的“山寨证书”，尽管内行人土嗤之以鼻，国家、社会和用人单位也不认可，但因为打着“职业资

格”旗号，甚至在证书上明目张胆地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因而对公众仍然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再加上这些机构和单位在一些平台大肆宣传所谓“零基础”“包过”“保过”，与“找工作”“升职加薪”挂钩，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劳动者上当受骗，花钱买了这些“价格不菲”的“山寨证书”。这笔“大生意”骗的是劳动者的血汗钱，挖的是“放管服”改革的墙角，毁的是社会公平正义，绝不能放任其野蛮生长、肆意妄为。

摘自《中国劳动保障报》

不自觉戴上“官帽子” 全职村干部官瘾有多大?

“不请人根本不忙不过来”。记者了解到，在中部某个人口较多的大村，除了村支书在内的7个村干部，还外聘了17个工作人员担任治保主任、财务会计、片区长、信息员等岗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村干部作为“公家干部”的角色正逐渐凸显。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村干部出现心态上的摇摆，向上看得多，向下跑得少，由此也产生一些村级治理新问题。

岗位作“跳板”，部分村干部想当“官”。南方某地一名村支书观察发现，确实有一部分人并不真正想来当村干部。“村里哪里缺电少路了他不知道，但是和上级的关系门儿清。”这名村支书说，一些村干部有官瘾，对了解民情、处理

矛盾不感兴趣，如果是和上面领导去沟通就很积极，但要他扎扎实实干一个项目，他又不愿意了。

指导变“指令”，上级组织把村干部当“官”管。记者调研发现，部分乡镇单位通过排名机制、竞相挂牌等方式，将行政任务转移到村一级，对于工作业绩排名较低的村干部，则要求在全镇大会上做公开检讨。压力之下，村干部或主动或被动地依附、贴近上级组织。

同时，上级组织在村级人事安排上也更为强势。湖北一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目前村支书岗位人选“上级主导得比较多”，择优配强的要求下，跨村任职或者派聘都有可能。东部某地一位乡镇干部认为：“村里谁来当主职干部，我的意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能让村干部

‘听话’。”

群众成“路人”，村民把村干部看成“官”。记者调查了解到，在部分农村地区，当地村民和村支书“不熟”“不认识”的情况并不少见。

村民和村干部沟通减少，容易产生误解甚至矛盾。记者了解到，南方某村在进行产业项目建设时，上级要求村干部先做通村民思想工作。但村干部担心项目亏损得不到理解，在没有充分沟通的情况下，深夜时填平部分村民耕地，招致村民不满。

当地村民认为，一些村干部有“官本位”思想，觉得自己掌握权力，“一事一议”等制度没有彻底落实，村里事务基本由村两委说了算，一些村干部擅作主张损害村民利益。摘自《半月谈》

摘自《光明日报》

打破隐性地方保护主义 让企业不用再到处开分公司、办工厂

最近有企业反映，在地方发展业务时仍会遇到不少障碍。比如，氢燃料车补贴政策出台后，各地发展氢能热情高涨，但私底下的态度却是以市场换产能，要求获补企业须在当地设厂。这种情况还比较普遍，企业初到一地，往往要专设分公司，以便把税收留在当地。这些企业呼吁，在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要求下，要拆掉地方保护藩篱，让企业不用再到处开公司、办工厂。

这些年我国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过去，因为市场分割，不少地方的人只能喝本地酒。现在，这些现象基本没有了。但也应注意到，过去地方保护的范围主要在商品领域，现在形式更为隐蔽，逐渐转向了服务业和生

产要素领域，或以技术、标准、监管等形式存在。

为什么地方保护主义难以根除？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地方分权尤其是财政包干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正向激励，由此也引发了一些地方的“一亩三分地”思维，尤其是受唯GDP思维惯性影响，地方对能带动当地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项目多有青睐，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保护，造成了市场分割，还大幅抬高了市场交易成本。这也是我国很多行业集中度不高，低水平重复建设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

对大国而言，内需应是经济之本，统一大市场则是其中关键所在。摘自《经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提升10个百分点。

但真正的促销以及刺激经济，或许并不是一个消费券可以解决的问题。白雪洁解释称，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心理现象就是心理预期，今年的疫情可能比2020年初带给人们心理上的预期冲击更甚，无论是对经济前景的不安，还是对家庭收入的担心都会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会有更强烈的增加储蓄防备不时之需的心理，而不是说民众真的没有钱而不能消费。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刺激消费的根本还在于能否为消费者提供这样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让他们能消费、敢消费、安心消费。这就涉及到如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保生产，恢复正常生活的问题。一旦生活回归正轨，即便没有政策的刺激，消费需求的内生动力也会源源不断地释放。”白雪洁总结称。

摘自《北京商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疫情给各层次各阶段教育教学带来了一系列困境。在疫情消退与回顾期，在基础教育领域，要考虑如何将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客观认识、经验教训转化成为提升教育治理水平、提升师生健康素养的新起点。

首先，应当转变教育理念，真正践行全面育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再次证明了全面育人的重要性，且要尽快补齐教育的一大短板——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教育。从科学素养来说，就是要让学生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和崇尚科学的精神，正确处理人与社会、自然、他人和自我的矛盾关系，学生健康生活，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从人文素养来说，学校应当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内在素养和文化底蕴。

其次，应拓展教育内容，延伸学生的知识跨度。公共卫生知识、健康教育、生命教育、灾难教育等关系到人的基础生存能力和生活价值导向，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实践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常常被忽视，这对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十分不利。此外，从此次疫情防控来看，由于缺乏对突发灾难的理性认识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不少学生产生了慌乱、焦虑、迷茫甚至抑郁的消极心理反应或问题。因此，学校教育应该延伸知识跨度，通过加强灾难教育和危机教育，使学生具备在灾难和危机面前理智判断、沉着应对、科学决策的生存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

最后，应变革育人方式，探索智能教育。疫情期间学生和教师居家学习和网上授课，教师从以往的面对面、手把手的“给予者”“控制者”转变为信息技术教学环境下的“引导者”和“激发者”，尝试了前所未有的“大放手”的教育教学方式改革，改变了以往不敢放手、不想放手、不会放手的状况，并以成长导师的角色，鼓励学生组建“学习共同体”，鼓励和督促学生开展“小组学习”“自主学习”，帮助学生在自主自律、独立思考、交流合作等方面获得成长。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摘自《光明日报》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

疫情之后 教育应如何转型